

廿二個冬天

彭逸才

— 15 —

本文係承史祖恩學長寄來，原刊「中國大陸研究」半月刊17期，史學長想係從文中發現作者爲交大民35級畢業生，而經過如此一段困苦的磨折，奔向自由，值得介紹給大家拜閱。

——編者

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像我這樣一個出身貧農家庭，而且對共匪的交通建設工程，付出了一定的貢獻；今天我却毅然地擺脫了共匪，冒着生命危險投奔了自由祖國，到了臺灣。這是什麼力量促使我選擇了這條光明的路？

新疆維吾爾族有一句諺語：「沒有經過嚴寒的百靈鳥，不懂得春天的可貴。」我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，度過了漫長的二十二年。我像一隻棲息在風雪山林中的鳥，吃不到食物，看着陽光，放眼四週的荒野，只是白茫茫的一片——我渴望春天，我爲懷念春天而嘆息、哭泣！可是春天在哪兒呢？

為毛澤東造橋

我是廣西省平南縣長樂村人。一九四六年在交通大學橋涵系畢業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，我曾經在政府妥善安置下，作過遼寧蓋平縣蘆家屯車站站長、鞍山

此共匪儘快發展交通。從株州到韶山沖修的鐵路，全長三十二公里。除了鐵路，還動員了成千成萬的農民和水利人員，修濬湘江，築建水渠，讓小輪船可以直駛韶山沖，使廣大人民去參觀毛澤東的故居。

湘江大橋只有一層，兩面是人行道。它的主橋一百五十米，加上副橋共有三百米長。從一九五一年八月開始動工，到了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正式通車（火車），一共費了將近兩年的時間。當時，我除了參加湘江大橋的工程，並且測繪到韶山沖的鐵路基線工作。

當時我和不少工程師或工人交換意見，我們覺得修建這座湘江大橋有什麼經濟價值呢？修建這一條鐵路支線又有什麼用途？展望大陸是那麼遼闊，需要建設的鐵路、公路實在太多，爲什麼共匪却急於修建這座湘江大橋？難道那個高踞北京城頭的毛澤東，他也想重溫古代皇帝的舊夢？總而言之，我對這個工程非常不滿。

雖然我當時對毛澤東懷着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心情，但是我並沒有對共匪絕望。一九五四年二月，共匪派我去漢口參加建築長江大橋，我當時心裏何等興奮！這座偉大的工程，曾動員了成萬的工程師和工人

工務段副工程師、北平行轅第四處鐵道運轉調度科長、漢口市商汽車聯運總隊長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共匪軍隊打進了廣西，從此我作了共匪的俘虜。

當共匪盤據大陸之初，對高級知識分子及技術人員採取「包下來」的政策。儘管不信任我們，但是由於需要大批技術人員從事建設，不得不採取「先利用」的手段，爲我們安置工作。南寧淪陷，我被送到廣州市南方大學作「政治審查」、「勞動改造」。由於我是貧農出身，共匪不久就派我返回故鄉，擔任設計南平縣的公路、水利等工程。一九五二年，我被調往湖南衡陽鐵路工程處工作。到了年底，我臨時被抽到毛澤東的家鄉——湘潭，參加建築湘江大橋的工程。

這座湘江大橋是從株州通往湘潭韶山沖的重要建築物。共匪盤據了整個大陸，毛澤東的出生地——韶山沖，成了人民羣衆和外國朋友「瞻仰的勝地」，因

，而且蘇聯也派了不少工程師參加工作。

那時我是「二級工程師」，每月領到僞人民幣一百七十五元，這個數目字在當時確實不少。在武漢工作期間，我曾臨時被派到寶成（陝西寶雞——四川成都）鐵路，測繪橋涵隧道。

因爲我親身參加過這兩項工程，所以我對共匪草菅人命的慘酷，看得最爲透徹。武漢大橋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動工，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正式通車。在這四年期間，蘇聯工程師殉難多名，成了最大的新聞。但是我們的工程師和工人死傷的人數，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了？至於寶成鐵路，由於鐵路穿山越嶺，共匪動員的工人、農民達十多萬人，參加築路工作。據說被山石壓死及爆炸而死的，就有三千人以上。在共匪和毛澤東的眼裏，中國人民真是不值一文錢的。

陶鑄勸我入黨

我在漢口時，共匪頭目李富春、陶鑄、鄧子恢和我感情不錯。有一天，陶鑄請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。陶鑄微笑地給我點上一支香烟，讚揚我的工作表現。

「你對黨的領導有什麼意見？」
「很好。」我笑着說。

「既然很好，你應該爭取入黨啊！」陶鑄的眼珠不停地轉動着：「你參加建設工作，就是爲人民服務。參加了共產黨，才能使你鍛鍊成又紅又專的人民工程師！」

我心裏早有了準備。我知道我的「階級成份好」，入黨並不困難。當時我的妻子兒女仍在北平。從廣西淪陷，我一直不能去北平和家人團聚，這是我耿耿於懷的事。

「你有什麼思想顧慮麼，彭同志！」陶鑄問我。

「我有缺點。」我坦誠地說：「我有喝酒的不良嗜好，等我決心戒掉了酒，再爭取入黨吧！」

陶鑄笑了，但他似乎十分滿意。他送我走出門口，握住我的手說：「黨需要你這樣的人才！」

那時，大陸各地正雷厲風行搞「反右派鬪爭」。起初挖出了「章羅反黨聯盟」（章伯鈞、羅隆基），最後對知識分子開展全面性的思想鬪爭。

我在一九五八年初調到北平「鐵道部工程司」工作。當時我和妻子兒女團聚，內心歡喜極了。可是不到半年時間，我的妻子却因爲受不住鬪爭與迫害而自殺了！

詩：「夢裏依稀慈母淚，城頭變幻大王旗。」突然，我哈哈大笑起來！

打開大門，我向暗夜的街頭飛奔。我怒吼着：「萬歲！萬歲！」

直到今天，我仍舊不知道當時是誰把我送進了協和醫院？我患了神經分裂病，住院達半年之久，直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才痊癒。共匪怕我惹事生非，特別調我去「中國科學院技術革新辦公處」工作。

雖然我受了慘重的精神刺激，但經過半年的療養，我確實漸漸恢復了理智。我爲了讓兒女們愉快地活下去，不因我的壞名聲而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前途，特地在報紙上宣布跟他們「脫離父子關係」。我內心的矛盾，自己解決了。從此，我決心抓機會逃出中國大陸。

科學工作者的苦悶

僞「中國科學院」編制非常龐大，它設在北平。郭沫若任院長。在大陸的中南區（武漢）、華東區（南京）、東北區（瀋陽）、西北區（西安）、西南區（昆明）和中央區（北平），設有科學分院；各省、專區、縣也都設置了專業機構。如果全部統計起來，

誰逼死了我的妻

我的妻子名叫陳潔梅，湖南長沙人，曾畢業長沙著名的湘雅學院。我和她是在抗戰勝利後的北平結婚的。那時她在協和醫院作醫生。婚後，她生了兩個男孩、一個女孩。北平淪陷後，她仍在協和醫院工作。共匪發動的「反右派鬪爭」，自一九五七年起，全面開展。許多知識分子深受思想上的迫害。因爲潔梅的階級成份不好，她的父親被列爲「資本家」，協和醫院的匪黨黨支部對她施以疲勞審問。起初，潔梅回家來憂鬱不樂，我問她有什麼苦惱，她也不說，只是偷偷地流淚、嘆息，好像得了病一樣。

就在那年的十月一日晚上，我參加天安門廣場集會，看罷慶祝僞慶焰火回了家。一進房門，聽得兒女嚎啕痛哭。

潔梅吊死在客廳，她伸長了舌頭，眼珠暴凸着，怒視壁上的那一幀毛澤東像，彷彿她正向毛澤東大罵！

我還能說什麼呢？我獨自徘徊在門前，仰望天上的星星，凝聽從天安門傳來的歌聲——那是頌揚毛澤東和共匪的歌。我渾身發抖，腦中湧想起魯迅的兩句

僞中國科學院容納的幹部達七、八萬人。

當時僞「中國科學院技術革新辦公廳」的負責人是黃玉生。時常指導我們工作的，就是著名的科學家錢三強。我的工作擔任「審查研究」，例如各地的工程計劃送上來，我作初步審查，再送交上級決定。同時，我經常有出差到各地的機會。

我接觸大陸各地的科學工作者、技術人員極多，他們普遍存有兩種難以解決的矛盾心理：

○對共匪「外行領導內行」政策，始終不能完全接受。早在一九五八年，北平「中國科學院」貼了「大字報」，就提出這個問題。據說當羣衆鬪爭的矛頭，指向了郭沫若。其實又怎能怪了郭沫若呢？——這是共匪的命令，郭沫若也不過是一個「傳聲筒」而已。

就在那一年，陳伯達在北京某大學演講，提出了所謂「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」兩句口號。什麼是「迷信」？打破「專家」「內行」包括在內。共匪的教條是一切科學家，應該用「馬列主義」和「毛澤東思想」作思想武器，才能創造，才能發明；不然，絕不會創造或發明，更不用談「爲人民服務」。根據這個邏輯，那麼「外行領導內行」是天經地義的真理。

共匪對科學家、技術人員的要求，是「又紅又專」。不僅技術好，更得思想好；技術專精，政治水平低，仍是等於零。這個邏輯，永遠辯論不清。同時它也是許多科學家、技術人員最感頭痛的問題。

①共匪對高級知識份子，始終抱着懷疑的態度。許多同事背後議論這句話：「毛澤東對高級知識份子，像小孩放鞭炮，又怕又愛。」說他「怕」，倒是真的。說他「愛」呢，倒不如說他「利用」還恰當些。由於共匪對高級知識分子心存畏懼、懷疑之心，整肅鬭爭也最嚴格徹底。因此許多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都感到精神恐怖，竟年累月懷着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心情。

試想一個人一年到頭，戰戰兢兢，隨時有被整肅的可能，這種日子怎麼活下去！

我走向了光明

一九六三年，我被下放到湖南長沙機電廠工作。翌年冬天調到湖南水利電力廳擔任技術設備的採購工作。一九六五年出差去雲南昆明，我在滇池偽裝自殺，被共匪解往桂林。這年五月，我被調到海南島參

加匪軍海軍「南海艦隊」，擔任榆林港的坑道暗溝工程。一九六六年夏，我趁着大陸發起了「文化大革命」，企圖偷渡越南，但最後却失敗了！

「文革」以後，大陸各地一片混亂。一九六七年，江青下了「就地革命」指示，我從海南島跑到廣州，組織了廣州市東山區的五、六所中學學生，成立「紅教造反團」，到處格鬥搶殺。後來黃永勝指我是一個「魔王」，說我的雙手「沾滿人民的鮮血」。我在廣州蹲不住，曾五次企圖逃向港澳，却都沒有成功。但是，我最後終於偷渡澳門，轉往香港，獲得了新生。

我必須聲明：目前大陸上很多科學家、工程師都有投奔自由的決心。在廣州時，一位名醫生（爲了他的生命安全，我不能指出他名字），曾計劃和我一起逃往香港，可惜他沒能逃出來，這是我引爲遺憾的事。

儘管毛澤東小集團統治了中國大陸，但他却控制不了廣大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。我那位醫生朋友一定會逃出來，這是我堅信不移的！現在，我到了臺灣，參加了反共復國工作。我今年四十八歲，我願以有生之年，把全部知識和技術貢獻給我的祖國。

曉轉齋散記

(十八)

胡博淵

一九四八年由美乘渝勝輪返華追記

一九四五年春，余由中國經濟部以技監名義派美考察重工業，以備戰後復員及建設之準備。抵美後，除常川壁茲堡視察半年外，又兼任日本賠償委員會中國代表團顧問。資源委員會亦聘余爲麥基顧問工程公司與中國政府聯絡員。一九四八年夏得部令催回部工作，值美國西岸船員罷工，行李過重，不能乘飛機，坐待機遇。適友人譚伯英君，爲復興輪船公司總經理。謂彼公司有貨輪十一艘，皆已返國，尙有最後一艘渝勝號，因修理遲行，即將啓碇，曷趁之返國。余欣然諾。

復興輪船公司之源起

抗戰勝利後，各輪船公司，遭敵人損失者，向政府賠償，名正言順之舉也，損失自數百噸至數萬噸以

上者，政府允予照賠，惟噸數太小而無法分賠者，應由各公司核計損失總數彙報，由政府一次賠償。結果政府共賠十一艘，係向美政府購其戰時自由輪用過之船，價僅造價什一耳，內有寧勝、滙勝、渝勝三輪，各一萬二千噸，餘爲五、六千噸者，因中興輪船公司，抗戰損失較大，公推錢新之爲董事長，聘譚伯英爲總經理。譚爲留德機械工程師，此爲中華民國首次有商輪往來國際航運事業。余正欲覓輪返國，得此機會，云何不喜，遂拼擋行李，大小十餘件，以笨重書籍居多。

由紐約啓碇

余於十六日晚，由友人錢行後伴送上船，珍重握